

养、成长的高度,重新认识家风家教的重要意义,十分迫切、至关重要。

苏东坡的父亲苏洵、祖父苏序,都是著名文学家。其家族“轻财好施,急人之病”等风气传承,史上记载实例很多。苏东坡的母亲程老夫人,与孟轲之母、岳飞之母并称为中国历史“三大贤母”。唐宋八大家,苏家出三人,并非偶然,这和苏家的家风与教育是分不开的。其中,有家庭世代耕读传家的风气涵养,有言传身教、严格约束的责任传承,有自幼严格管好自己的习惯养成。

苏东坡的“学霸”经历和“不可无一,难能有二”的历史地位,同样是自幼受父母严厉管教的结果。绍圣四年(1097年)七月,苏东坡贬谪海南儋州,抵达后十来天,忽有一夜惊醒,遂写下《夜梦》一诗,记述幼年读史苦不堪言,其中写道:“夜梦嬉游童子如,父师检责惊走书。计功当毕《春秋》余,今乃始及桓庄初。怛然悸寤心不舒,起坐有如挂钩鱼。”已经六十多岁的东坡老先生,夜里梦回童年,父责如师,布置作业通读《春秋》完毕。待父亲检查时,正在嬉戏玩耍的苏轼刚读到鲁桓公、鲁庄公,痛苦悲惨啊,心病要犯了。突然惊醒,原来是梦,才如同鱼儿脱钩一般。可见幼年苦读,印象极深。

东坡幼子苏过,陪同照顾老父,居儋三年,父子以读书、著述、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,“食芋饮水,以著书为乐”。东坡给朋友写信说:“儿子到此抄得《唐书》一部,又借得《前汉》欲抄。若了此

二书,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

家族内,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;社会上,扶危济困、为政以德;生命中,顽强智慧,宠辱不惊;执政时,坚守民本,为政清廉。这样的家风家教,是“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,努力成长为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之才”的必由之路。

严谨的执政实践:勤劳为民

清廉的意义与价值,最终应当体现在勤政为民的实践之中。1989年1月,习近平同志在《摆脱贫困·干部的基本功—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》一文中说:“对党员干部来说,很重要的一条,就是既要做到‘廉吏’,又要当‘勤官’,既要廉政又要勤政。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。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的诸葛亮,要求自己做到‘不使内有余帛,外有赢财’。司马光‘欲以身殉社稷,躬亲庶务,不舍昼夜’,‘于物淡然无所好’,‘恶衣菲食以终其身’。封建官吏尚能如此,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!”“恶衣菲食,以终其身”,是苏轼所作《司马温公行状》中,对司马光的高度评价。

苏东坡一生,有许多勤政爱民的感人故事。杭州治湖、密州灭蝗、徐州抗洪、登州罢盐、扬州清欠、颍州赈灾;被贬之后,无权无势,仍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,为当地民众治水、修桥、医病、助农等。元丰八年(1085)夏,苏轼调任“知登州(今山东省蓬莱市)军州事”,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任上,十月二十日即接旨召还京都开封,升任礼部郎中、中书舍人。在登州任

上仅有五天时间,他深入调查民众疾苦,发现“居民咫尺大海,而令顿食贵盐,深山穷谷,遂至食淡”,朝廷指定买卖内地官盐,禁止当地制盐贩盐,民怨沸腾。东坡即上书《乞罢登州榷盐状》,后朝廷批准,登州莱州民众持续食用本地海盐数百年,民感其恩,修建祠庙祭拜,后世称颂“五日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。

为官清廉,目的是为民做事。既不贪宝,也不做事,懒政思维,无所作为,都违背了清正廉洁教育的初衷。

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市“三苏祠”时指出:“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。”吾之所有,在于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情景审美,也不仅是防止非分获取而葬送清廉的政治警示。这是一种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清高且自然的情怀。毫无疑问,《赤壁赋》中展示出来的“苏轼的这份情怀,正是今人所欠缺的,也是最为珍贵的”,同时,也是我们建好自贸港,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,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,所需要珍视、需要弘扬的。■

(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、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)